

■新作聚焦

# 丁晓平报告文学《红船启航》：百年大党精神史的本真叙事

□丁晓原

丁晓平是一位低调而卓有成就的军旅作家。他的写作涉面广博，但尤以党史、革命史的系列性书写，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领域，醒目地标示出其独特的行姿和重要的位置。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相关的文学主题创作蔚然而成热点，一时可读作品连续推出，成为这一年报告文学的特色和亮点。这其中就有丁晓平出版的长篇《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和《红船启航》，两部作品充分显示了丁晓平历久积淀喷薄而出的创作爆发力，更彰显了一位军旅作家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精神，这也是激发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地持续创作的力量之源。

主题创作是基于时代特定主题而设定的写作类型，其前提关键在于既要充分把握主题创作的总体要义，又要寻得具有某种新意深意的具体的创作主题，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的写作达成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无疑，《红船启航》是深得其中的大旨的。自然，关涉党的百年华诞的写作题材十分丰富，但红船叙事可能是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穿透力的重大核心题材之一。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及其领导机构。南湖游船见证了百年大党应运而生的模样，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的“母亲船”。从一条诞生了世纪伟人政党的普通游船，到一条革命的纪念船，再到一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红船，这条船承载了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苦难辉煌、战胜艰难险阻，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恢宏历史，抒写着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和依靠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命运交响曲。

红船启航，百年风华。红船是一个硕大而深有蕴藉的意象。红船中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也大写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独具价值的“红船精神”。丁晓平的《红船启航》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用厚重的历史叙事和生动的现实回响，将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作了有机融通系统完整的呈现。可以说，这是一部百年大党精神史的本真报告。这里的本真既指相关的历史叙述的客观求实，更意指作品对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等党的精神本真的具体生动的再现。在建党百年这一重大的时间节点上，作者这种对红船题材及其深刻主题的独特建构，奠定了作品基本的核心价值。

■短 评

## 何处才是年轻人的家

——2021《人民文学》“九〇后”专栏述评 □贾 想

从2017年第1期开辟“九〇后”专栏至今，《人民文学》在该栏目内外推出了34位“90后”作者的36篇小说作品，进而形成了写作队伍“七代同堂”的蔚然局面。在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专业期刊的关注扶持之下，年轻的面孔层出不穷，让人惊喜的作品不断问世。他们有郑重甚至严格的创作态度，还有一种个人的自觉：重视对自身写作风格的塑造，努力通过经验、语言、选材的差异性，将自己从群体中区划出来。但这样一来，想要给他们集体命名，或者归纳一种代际的总体风格，困难就出现了。

在看到“90后”的创作枝繁叶茂的同时，很难说他们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气候。他们当中没有出现过写作的共同体，还没有哪种力量能够将他们统一起来。过去那种基于代际、地域、流派、标签，贴到他们的身上并不奏效。他们是散点的、单打独斗的，是千帆竞发，自己摸索自己的航线。2020年，《人民文学》刊出了8篇“90后”小说就是如此。有的故事稳扎稳打，有唱腔、有念白，由表及里都是对传统的发扬。有的是天外飞仙，临门一脚，一时让你分辨不出哪门哪派。有的百转千回，恨不得一吟双泪流。有的却调皮而疏离，人物在里而思考，作者却在外面发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全体总结这8篇小说，我认为他们写的是：年轻人和他们问题重重的家。“家”有很多种。奥德修斯的家和高老头的家，贾宝玉的家和党新、党民、党慧的家，马多寿的家和白嘉轩的家，产生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家涉及很多层面：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形而上学。围绕家产生了几个绕不过去的文学母题：离家、找家、回家、分家、毁家、建家，“大团圆”与“小团圆”……关于“文学中的家”，足以写一部巨著。

在文学新人的笔下，家往往是一个否定性的空间。巴金写高老太爷的家死气沉沉，张爱玲让曹七巧在姜家一点点枯萎，余华小说生涯的起始是离开家远行。年轻人与家的紧张关系，几乎成为新人写作的一个无意识母题。这8篇作品同样展现出类似的气质：年轻人身处的家，是泥泞的、压抑性的所在。或者是父母决裂（《晚春》《飞往温哥华》），或者是兄妹阉割（《李北的一天》），或者是母女疏远（《破水》《众乐乐》）。但这些作者不止于此，他们仍然渴望一个共同体

“主题创作是基于时代特定主题而设定的写作类型，其前提关键在于既要充分把握主题创作的总体要义，又要寻得具有某种新意深意的具体的创作主题，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的写作达成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报告文学的书写，作品的主题可以由作者以精论的方式直接给出，但作为非虚构的叙事性写作方式，作品的表现力，包括主题的表达，更需要通过真实具体生动的叙事才能有效地达成。《红船启航》正是通过作品整体性的系统叙述加以深刻阐释的。作品由两部分构成，即上卷《红船劈波行》和下卷《精神聚人心》，分别叙述中国共产党怎样成立，中共一大怎样召开和南湖纪念馆怎样建立，红船精神怎样提出和弘扬等四个重要话题。上卷是全篇叙事发生和展开的逻辑基础，下卷则是叙事的递进和升华。四个话题的完整叙述构成了文本的基本内容。从题材的类型看，《红船启航》属于史志性写作。这类作品的成功书写，有赖于作者对相关历史总体的理解把握和对需要进入文本的具体材料的熟稔研究。不是那种从材料到材料的简单组装，而要置备相应的史学知识和能力，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专业化水准。丁晓平并不是中共党史专业出身，但他一直在从事党史重大题材的写作，创作出版了毛泽东、邓小平、陈独秀、王明、蔡元培等历史人物的传记和有关五四运动史、长征叙述史、二战外交史等报告文学作品。这种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系统选修自学的过程，历练日久，从而使他能入乎其内，融会大要与细节，成为在这一领域具有充分发言权的写作者。

《红船启航》上卷落笔于中共二大的召开，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伟业真正完成”，详写的则是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和中共一大的全过程，以及一大前的思想、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复杂斗争和国情、世情、社情的大趋势。这一阶段的现成史料非常丰富，但丁晓平不满足于简单地取用，而是在对相关第一手材料进行仔细研读的基础上再作辩证分析，从而获得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有说服力、公信力的叙事材料，然后灵活采取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将丰富的史料有机地纳入作品的叙事之中。如，对《新青年》重要专辑文人的细研细研，对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办的第一个机关理论刊物《共

产党》有关信息的认真挖掘等，由此使自己得以最大可能进入到特定时代的思潮和舆论氛围，获取非虚构写作应有的历史现场感。

下卷的写作，作者致力于运用档案查询、当事人访谈口述、实地考察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发现发掘游船原型寻找、纪念船建造、纪念馆建设等大量的新鲜鲜的真实的资料。不仅如此，丁晓平还十分注意对庞杂的历史资料去伪存真的辨析求真，以确保作品采入史料的科学准确，如对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多处误记考辨纠错，对出席一大代表人数是12人还是13人一一查考，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对史料采取的严谨之风。凡此种种的努力，使得《红船启航》全篇的叙事建立在厚实准确的史料基础之上，具有了某种学术性的充分的历史性。丁晓平说过，“历史就是史实和真相，保证作品的‘真实’；学术就是思想和观点，保证作品的‘严谨’。”《红船启航》达成了作者所想要的“历史”和“学术”。

丁晓平是具有比较清晰的报告文学创作观的作家，一直致力于“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采取作品的“真实、严谨、好看”。《红船启航》可謂是这种创作观的又一次践行。报告文学的“文学”和“好看”，在主题创作中相对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如何在非虚构的历史叙事中发出“文学”的光彩，显得很是重要。《红船启航》是颇为“文学”的。一是作者注重文学的结构设计，作品从“小王老师”王会悟的个人故事起笔，并且将其作为作品的结构性人物，这显示了作者叙事的智慧，因为她不仅是中共一大全程的在场者，而且也是纪念船始作的见证者。二是作者能根据历史逻辑和人物逻辑，生动再现特殊语境中的人物及其活动，具有较强的历史现场感，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物的精神形象再现得达人得神。三是作品的语言具有充分的表现力，叙事语言求真而外，内蕴着作者的理想信念，敬仰信仰之深情溢于言表，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不愧是一部有筋骨、有情怀、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责怪破水(母亲),但强烈的本能,又一次次让她失败,把她打回原形,退回对破水(母亲)的依赖当中。小说完全写出了当下年轻人的身体感觉:一个亢奋的、难以驯服的、高度敏感的身体。胖与瘦、爱与怨、自卑与自尊、生物性与道德感,哪怕产生的冲突只有一点点,也会引发整个身体的山崩与海啸。这种全新的身体经验,在作者写饥饿的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写饥饿,就像在写住在身体深处的恶魔:“强烈的虚空应该来自比血液更深的地方。它不说话,在我胸膛种下一颗眼睛,久久注视;它也不哭诉,在我耳边开出一张嘴巴,回声隆隆。”“我说妈妈再生我一遍,再生我一遍。然后我开始吞噬我的内脏,我的肌肉。”这种强度的描写让人想起莫言的能力——让小说能能量沸腾的能力。

蒋在《飞往温哥华》写的是家的“破镜重圆”,但只是形式上的“破镜重圆”,离异夫妻重聚,因为儿子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这时他们已经一个人老,一个珠黄,相聚的拥抱不是爱在复燃,只是一团灰灰在向另一团灰灰取暖。施冰冰《众乐乐》几乎是一个弗洛伊德的案例,女儿无法原谅母亲的外遇,无知无觉当中,她选择通过艺术创作疗愈自己的创伤。当她想出电影结尾的时候,也单方面与母亲达成了和解。小说暗示了艺术与创伤、道德与禁忌的关系。相比于女性作家,男作家似乎很少被“小家庭”所伤害,对于“小团圆”的渴望也没有女性作家强烈。他们关心的是不是家庭内部的险象,而是更宏观的家族的危险,“大团圆”的危机。韩彬《永乐店逸事》写的是村庄的灾难时代,这个文本似乎是对疫情的一种回应:我们应该以长时段的乐观眼光看待眼下的灾难。时间长了,一切都会过去。徐威《慢生十二式》当中的危机感几乎是古典的,对于家族断代的恐惧。小说以厨艺传承的不易,写一个家族的传承之艰难。家的危机的承受者,是一整个“族”,而不是一个现代的“人”。

杨如寒《水漫蓝桥》同样是一个古典的故事。作者写“人生如戏”的母题,写对称的宿命论,笔法相当老道,语言活灵活现,浸透了油水,初听不知滋味,再听已是戏中人——《蓝桥》中的悲情唱段,成为现实中无家可归的男女的判词。作者不玩花的,运用功力唱念做打,体现出扎实的小说素养。我一直在读“90后”作家的作品。读完这几篇小说之后,我更加相信我的判断:“90后”是郑重其事的一代,也是为文学道路上的艰难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一代。年轻人正在认真写作,宴会的座位也已经专为他们留出来。他们已经坐下去。他们正在写出来。

■创作谈

作为一名业余从事历史文学尤其是党史重大题材报告文学创作20年的作家,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作一部能够留得下来的优秀作品,是我的初心和梦想。正是怀着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早在2008年创作《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时,我就开始准备和酝酿,把1919、1949和1979这三个特殊的年份作为考察中共党史的坐标点,并以它们为中心辐射前后3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立志完成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从觉醒与诞生、崛起与改革到改革与开放的“时代三部曲”,坚持以大历史观、以文学的方式重述我们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理直气壮地书写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精神史诗。因此,与其说我在等待着《红船启航》,不如说《红船启航》也在等着我。

2018年9月2日,我第一次来到南湖,登上了红船。我知道,我的瞻仰也是“朝圣”。在嘉兴,我整整生活了十天十夜,采访了我想采访的,看到了我想看的,听到了我想听的,还见识了许多连嘉兴朋友们都没有见识的宝藏。这些档案、文献、回忆录、传记以及报纸、期刊等,都属于历史的原始资料,是历史写作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但回到北京,足足有半年时间,我不知如何动笔,只能静下心来,经常是一个人深夜在台灯下静坐、细琢磨。我知道,我正在做的这件事的意义和价值。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房中,或倾听采访录音,或阅读复印档案,或翻阅嘉兴史志,在思考中回味,在回味中构思,在构思中提升。研究历史是无边的诱惑,写作是无尽的劳碌,我需要闹中取静,在无日的喧嚣中寻觅净土,把史料转化为可读的有趣有益的词汇,既要言之成理,又要读之有味,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既要客观不倚,又要留有余地。这是一个鉴别、选择和叙述、表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艰苦的,是费力费神费苦着的,是不急不躁兴奋着的,也是痛并快乐着的,还需要自信和勇气。

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20年来,我积极探索“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努力追求实文并重,达到文学和史学的统一。因此,我的创作不仅要保证真实、完整,还要生动、形象。如今,中国共产党已走过苦难辉煌、光荣梦想的100年,有关中共党史的书籍汗牛充栋,大多是历史学家、学者和权威机构编写的通史、简史类的编年史,偏重于史料性、文献性、学术性、政治性,读者在阅读之后往往只能了解一个大概脉络,并不清楚当时的历史现场和人物人物的细节、命运,党的创建实际上成了人人知道却又不完全知道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因此,我决心在《红船启航》中解决这个问题,把党史写活起来,写出活的党史,写出一部兼具故事性、文学性、学术性、普及性的,让人民群众爱读、准确、权威地了解并掌握党的创建史的大众读物,力求既真实好看又有趣有益,既

# 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

□丁晓平

有筋骨又有血肉,见人见事见精神,让读者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其必然。从创作实践来看,历史写作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依然保持新鲜和悬念,在推陈出新中无限接近和抵达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从而让人人都能在历史中看到新意,读出新思想,获得新启迪。那么,我该如何才能完整地叙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创立的,二是在完整叙述中共一大是怎样召开的;三是在完整叙述南湖革命纪念馆是怎样建起来的;四是在完整叙述红船精神是怎样提出和弘扬的。这四项任务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实际上所要回答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重大时代命题,以文学的方式来解读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本质。

《红船启航》分为《红船劈波行》和《精神聚人心》上下两卷,以习近平总书记《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中的这两句经典语录为标题,科学地解决了叙述的结构和逻辑问题,作品的思想高度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上卷《红船劈波行》写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即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在党醒年领导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到相约建党和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革命者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历史),回顾中共一大召开的全过程,全面细致地呈现“从红楼到红船”艰难曲折、劈波斩浪的历史画卷,写的是“党心”;下卷《精神聚人心》写南湖革命纪念馆建设史(即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关心南湖革命纪念馆建设和瞻仰红船的历史),回顾红船精神从提出、弘扬到结出硕果的全过程,完整生动地呈现“从石库门到天安门”风正帆悬、乘风破浪的历史画卷,写的是“民心”。《红船启航》将历史和现实的两条红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穿越百年时空,感受百年风云,回溯百年沧桑,贯通了党心和民心,融通了初心和信心,最终以《烟雨红船鉴古今,大浪淘沙见初心》收笔,以国家叙事的文学样本书写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史诗,让人们在文学和历史的阅读中看见“穿越百年最美是初心”。因此,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红船启航》的创作所追求的正是对伟大建党精神丰富内涵的文学阐释和本色表达,希望给广大读者尤其是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送上一份新时代的启示,从而更加清醒、深刻地理解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穿越百年,初心最美丽。在采访、创作《红船启航》的日子里,翻阅百年历史,阅读红船往事,追寻中共一大代表的足迹,聆听昔日红船启航地、今日共同富裕示范区人民的的心声,也是寻觅、重温和坚守初心的旅程,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自我革命的思想洗礼。

## 警示世人的现代寓言

——读徐贤林《人与鼯》 □陈惠方

一口气看完徐贤林的《人与鼯》这篇不足万字的小小说,我被极度震撼了。这是一篇警示世人的现代寓言,一部撼人心魄的血色童话,一部生态文学的奇思佳作。作者绘声绘色、传神尽相地描写了一个渔人同国家保护动物“鼯”之间悲惨凄绝的故事,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互依互存、相生相克、同舟共济的天则,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作者说过,他写这个作品,是有感于一些人在国家级风景区楠溪江(小小说中“荆竹溪”原型)违反规定滥采滥挖、乱造水库、毁林造田等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而奋笔直书。现从四个方面对这篇奇思妙想的短制佳作《人与鼯》进行解读。

徐贤林在“创作谈”中如是说:“楠溪江生态问题如一块巨石压在我心头,无法释怀。我要用文学的形式将这个问题披露出来。我虚构了一个在狮子岩水域打了半辈子鱼的老渔民,直接与楠溪江水生动物中最顶端的掠食动物鼯冲突。他10岁时初战鼯鱼互有损伤,他们没有互相报复,反而相安无事,因为水里鱼类足够他们各取所需。但50年来,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与鼯争食的矛盾日益凸显,决斗不可避免。你要灭它一族,它便灭你满门,这是最原始朴素的复仇方式。生态链就如一副多米诺骨牌,任何一环出问题便会发生整副牌崩塌的严重后果。”徐贤林凭借这芥豆之微、蝼蚁之形鲜为人知的小人物、小故事,在经意与不经意间触碰乃至直击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生态大命题。

“作者的了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恩格斯语)《人与鼯》是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切感受。作为保卫楠溪江生态志愿者团队成员的徐贤林,对楠溪江生态环境破坏的严峻情况痛心疾首,决心将那“血腥的呐喊”付诸小说书写,一吐为快。其时,正值身为记者的他刚刚采写了一组反映楠溪江生态破坏的系列报道。按说,凭借这些素材,以他当时强烈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倾向,直奔主题,撰写一篇“纪实小说”或“非虚构文学”或许也能赢得一些读者。但作者却迎难而上,独辟蹊径,只用了他熟悉的生活原物和积累的素材的“魂儿”(林斤澜语),精心编织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荒诞小说《人与鼯》。小说从头至尾,无论是场景描写或是人物对话,通篇不见一字一句诸如“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等字眼,没

有直白的说教,却起到了以小见大、察微知著的艺术效果,隐含、承载了人类生存的大道理。

小说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乃至决定小说的格局、思路、走向、容量、体态与状貌。读《人与鼯》时,令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老人与海》,两者结构有着相似之处。虽然《人与鼯》的篇幅仅为《老人与海》的四分之一,但其承载故事发展的演进逻辑和人物(含拟人的鱼们)活动的行为轨迹的两条情节线,两者却极为相似,两部小说都各有两条情节线,两部作品中的第一条情节线中的人物均是老渔夫:一为老渔夫桑地亚哥,一为老渔夫朱晨清;第二条情节线中的“人物”均为鱼,一为马林鱼和鲨鱼,一为鼯王和团鱼。《人与鼯》同《老人与海》的结构情节上如此相似,原来我深以为这是作者借鉴模仿的结果,及至我得知他当初并没有看过《老人与海》,纯属作者原创时,我大为惊讶,感到匪夷所思。就《人与鼯》中的两条情节线发展变化而言,它们或相向或逆袭,或平行或交叉,通过谋篇布局、“排兵布阵”,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巧妙建构了人与鼯从和谐相处到相互争食到冤冤相报乃至同归于尽的惨烈结局。

小说《人与鼯》的语言简约、轻浅、朴实、妙曼,所谓“简约”,就是作品不“水”,时下有些时尚小说作家,写的小说很“水”,车轱辘话一大箩筐,《人与鼯》则迥然不同,语言精练,点到为止。如对主人公朱晨清出场时的形象描写:“黝黑的面颊上嵌着一双鱼人特有的犀利眼睛,与他的鸬鹚群浑然一体。”仅此点睛之笔,再不添枝加叶。所谓“轻浅”就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掉书袋,文字明白晓畅,读来朗朗上口。所谓“朴实”就是不卖弄、去粉饰、接地气,不生造那些不靠谱的“网络语言”及一些粗俗轻浮的怪腔怪调。所谓“妙曼”就是作者经过提炼的生动优美的语言,如“诗意在盛夏晨风和粼粼波光中一层层荡漾开去”等,再如老渔夫朱晨清与鼯王在荆竹狮子岩水域的最后一次生死搏斗,描写得惟妙惟肖,笔传神。

一次,贤林同我聊天时坦言:“三天不写稿,心里就发毛。”贤林的文字之所以能如此精致、老到、成熟、劲道,与他写作勤奋,不舍昼夜,笔不停挥,“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有关。“厚积有物,勤练笔生花”(魏巍语)是也!